

盛世风尚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研究

王丽梅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金银器在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金银是贵金属，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易锤打成形，又有亮丽的天然色泽，且不易氧化变色，是制作工艺品的良好材料。自从人类发现、认识了金银之后，就将其加工成为各种金银制品。

盛世风尚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研究

王丽梅 著



金银器在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金银是贵金属，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易锤打成形，又有亮丽的天然色泽，且不易氧化变色，是制作工艺品的良好材料。自从人类发现、认识了金银之后，就将其加工成为各种金银制品。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晓燕
责任校对:张伊伊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风尚: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研究 / 王丽梅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690-1865-3
I. ①盛… II. ①王… III. ①金银器(考古)—装饰美
术—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K876.4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8162 号

书名 盛世风尚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研究
SHENGSHI FENGSHANG
——TANGDAI JINYINQI ZHUANGSHI YISHU YANJIU

著 者 王丽梅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865-3
印 刷 四川和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40 mm
插 页 5
印 张 17.25
字 数 38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ress.net>

前言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研究”仅是中国装饰艺术领域中的一个专题，它属于跨学科的探讨，可以从文物学、艺术史、文化史等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本书希望通过具体的研究过程，将这三个学科进行结合，寻找材料、方法上的联系，从而打通三者之间的界限，这也是当代“艺术史”这一跨学科的研究目标之一。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是我国传统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人们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社会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对金银器装饰艺术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唐朝的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发展状况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对唐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全面认识，完善我国装饰艺术史研究体系。本书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系统的研究。

本书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对唐代金银器的兴盛缘由、考古出土情况及金银器的品类进行了梳理。第三章以考古出土文物为基础，对唐代金银器的器形设计以及背后所蕴含的设计意识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对成器工艺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第四章对唐代金银器的纹饰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根据装饰题材的不同，将金银器的纹饰划分为四类，即动物类、植物类、人物类、几何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类题材的起源、演变及部分纹样蕴藏的精神内涵，对纹样的构图形式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总结，同时，对金银器的装饰工艺应用进行了阐释。第五章探讨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与宗教文化、外来文化、世俗文化和绘画的关系。第六章对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视觉表现进行了阐释。第七章总结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蕴含的美学思想。笔者在以上各章的支撑下阐述了个人的研究结论。

本书采用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文中已一一标出。文中采用的大量图像除少部分来自个人在博物馆中的拍摄外，主要来自法门寺博物馆、韩生编著的《法门寺文物图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的《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齐东方、申秦雁主编的《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齐东方著的《唐代金银器研究》，施万逸主编的《海外珍藏中国青铜器金银器铜镜精品集》，杨正宏、张剑主编的《镇江出土

金银器》等。与此同时，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参考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及文献，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该书的出版受到西华大学重点项目“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研究”（项目编号：ZW1123110）和西华大学教学团队“传统艺术创新设计与研究教学团队”的资助。

鉴于作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著 者

2018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动机及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7)
第二章 唐代金银器概况	(10)
第一节 唐代金银器兴盛缘由	(10)
第二节 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银器	(14)
第三节 流散域外的唐代金银器	(18)
第四节 唐代金银器的品类	(25)
第三章 唐代金银器的本体性装饰	(27)
第一节 唐代金银器的造型	(28)
第二节 本体性装饰工艺	(55)
第四章 唐代金银器的附加性装饰	(68)
第一节 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饰	(68)
第二节 纹饰的装饰工艺	(156)
第五章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与多元文化	(165)
第一节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与宗教文化	(165)
第二节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与外来文化	(183)
第三节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与世俗文化	(187)
第四节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与绘画	(195)
第六章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视觉阐释	(226)
第一节 材料的美感	(226)
第二节 图像的表征	(232)
第三节 视觉的转译	(236)

第七章 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243)
第一节 繁而有序.....	(243)
第二节 兼容并蓄.....	(247)
第三节 富有情趣.....	(251)
第四节 工艺精巧.....	(253)
第五节 以圆为美.....	(256)
结 论.....	(260)
参考书目.....	(26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动机及意义

现代学科通常将装饰作为造型艺术的一个艺术门类和一种艺术样式，而美化生活则是其主要的目的。实际上，装饰艺术所涉及的领域和范畴远远不止于此。装饰现象形态多样，包罗万象，几乎延伸至人们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装饰艺术本身的发展轨迹表明，它是自然形态、物质形态、技术形态、社会形态和人的思想观念形态的综合产物，是人类社会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有机体。它往往直接或间接地记录和承载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片段或某种观念意识的若干侧面，并且密切地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阶层或普通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审美的需求。^①因而，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完整的装饰史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②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在当时有着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对于装饰艺术而言，其在唐代发生了惊人的历史性变革：传统的动物题材退居其次，植物花鸟成了唐代纹样的主流。自此，以动物纹为主的装饰题材时期渐告终结，开始了自唐以来以花鸟为主的装饰纹样时期。这不仅反映了纹样题材的变化，也反映了装饰意义的转变。^③而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却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尽管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对唐代的装饰艺术有所涉足，但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种工艺门类（如纺织、铜镜）或某一种类植物纹样（如莲花、忍冬）的“片段性”研究，缺乏对唐代装饰艺术的系统的、整体的研究。还有一些资料，比较侧重纹样造型的图谱性编辑，而忽略了造型与人文背景的综合性分析。虽然已有的研究带有一定局限性，但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给笔者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启发笔者以唐代的金银器

① 翁剑青. 形式与意蕴：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八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② 李砚祖. 装饰之道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5.

③ 田自秉，吴淑生，田青. 中国纹样史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22.

为载体,系统而综合地对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进行研究。

工艺精湛、装饰富丽、造型多变的金银器,无疑是大唐文化、大唐时代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也是唐代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目前从艺术史、文化史角度对其展开的研究甚少。当然,对唐代金银器的研究并不是空白。不少中外学者从古代文献的记载、出土文物的考证、现代考古学的分期断代以及纹饰义理等方面对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涉及造型、纹饰的分类分型方式、纹饰的内涵、纹饰的组合配置、装饰的方法等。但由于研究角度、侧重点的不同,这些对金银器装饰艺术的研究多涉及个别方面,特别是对金银器装饰艺术的艺术史、文化史等体系的系统研究较为薄弱,还需加强。此外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

第一,关于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系统性研究问题。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应包括造型、装饰题材、装饰工艺、装饰手法、与绘画史的关系以及其揭示的社会文化和艺术观念等系列内容。目前,学者们对唐代金银器的研究多从历史学的角度将其进行分期断代,对器物形制和装饰纹样演变进行分析,而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对唐代金银器工艺装饰方法、形式、与绘画史的关系和时代的思想观念等尚缺乏系统性分析。

第二,唐代金银器装饰纹样的演变过程和内涵研究。唐代金银器装饰纹样的时代风格通过纹样的演变来表现,但纹样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学术界仅对个别纹样的某个时段的特征作了类型学分析,而对装饰纹样的演变过程尚无系统梳理。学者们对唐代金银器装饰纹样的内涵的探讨也多以个别纹样为主,没有和纹样所处的时代背景相结合。

第三,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与唐代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问题。唐代金银器装饰纹样涉及当时的宗教、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方方面面,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但是和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最为密切的时代审美观念问题,长期以来很少受到学者重视。笔者认为思想观念(包括审美观念)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艺术美学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所以通过金银器装饰艺术所透视出来的唐代审美观念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另外,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长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有助于完善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史的研究内容。装饰艺术不同于纯艺术,前者更多地显现出艺术形式及文化内涵的多样性、包容性,并在显现其艺术历史性的同时凸显深厚的人文与地域特性。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恰在诸多方面跨越了一般意义的实用性的限制,也自然跨越了纯粹个人表现的艺术层面,更加呈现出其综合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含义,从而也就具有更多的人类文化学意义和更为恒久的艺术魅力。^①尤其在当今社会,国际装饰领域越来越注重民族风格的体现,从传统艺术中汲取灵感成为现代设计的风尚。这就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古代艺术宝库的价值,深感有必要、有责任去回顾和探索

① 翁剑青.形式与意蕴: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

中国古代传统装饰艺术的发展流变，从而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

第二节 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唐代金银器的关注由来已久，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历史学界就开始将研究视野投放到这个领域。随着英国学者B. L. 霍伯森(B. L. Hobson)公布了相传出土于洛阳北邙、收藏于不列颠博物馆的15件唐代金银器，日本出版了《东瀛珠光》《正仓院御物图录》，发表了日本收藏的一些唐代金银器。此后，作为藏品的唐代金银器不断得到介绍，国外的学者如日本的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石田茂作，德国的A. 格拉夫·施特拉赫维茨(A. Graf Strachwitz)，瑞典的俞博(Bo Gyllensvard)等，对唐代金银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① 这些研究始于国外历史学。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国内的学者在该领域对唐代金银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础资料的发布

基础资料的发布主要涉及三类：第一类是考古发掘报告，第二类是金银器的图录汇编，第三类是文物品鉴类文章。国内学者是随着唐代金银器考古发现的增多逐渐涉入该领域研究的。发掘报告成了学者们研究的重要材料，如《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1972)、《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1977)、《浙江长兴县发现一批唐代银器》(1982)、《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1982)、《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1985)、《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1985)、《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1988)等，为当代唐代金银器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

随着进入公众视野的唐代金银器的增加，不少图录汇编著作出现，主要有：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唐代金银器》一书，收录136件器物，附有《唐代金银器概述》《试论唐代南方金银工艺的兴起》《金银器与唐代进奉之风》《唐代白银地金的形制、税银与衡制》《唐代冶银术初探》5篇论文；1989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韩伟编著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其中共收器物290件，包括收藏于外国的一百多件器物，每件器物用线图展示，且都有较详细的说明，卷首还有“简论”一篇；1998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韩伟等编的《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金银器卷)；200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一书，对何家村出土文物做了详尽的介绍，图片资料翔实，印刷精美；200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法门寺博物馆、韩生编著

^①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

的《法门寺文物图饰》，对法门寺出土文物的局部、细节、出土时的情况用图像进行了清晰细致的展示；201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施万逸主编的《海外庋藏中国青铜器金银器铜镜精品集》，其中收有金银器物几十件，印刷精美，具有很强的收藏价值，唯一不足之处是缺少对展示器物的收藏地点及时代等基本信息的介绍；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镇江出土金银器》，该书中有对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的基础数据介绍。这些图录内容丰富，兼具艺术性和收藏性，同时亦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也成了本书研究的基石。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还有不少文物品鉴类文章，如谭前学的《鹦鹉纹提梁罐与盛唐气象》（1998），高嵘的《独角翼兽纹六曲银盘》（1999），韩建武的《陕西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上、中、下，2002），韦用的《唐代金银器之珍品——“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2003），董建丽的《唐代胡瓶》（2004），申秦雁的《舞马衔杯纹银壶——再现唐玄宗生日庆典盛景》、《金盆：再现皇家奢华生活》（2008），蔡国声的《唐代金器鸿雁纹小碗》（2006）、《晚唐莲叶伏龟金盘鉴赏》（2010），谭前学的《富丽堂皇中西合璧——唐代金银器巡礼》（上、下，2010），梁敏、张桢的《盛世遗珍匠心独具——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钫赏析》（2016），蔡琳的《盛放莲花大唐气象——鸳鸯莲瓣纹金碗》（2016）等。这些文章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可供研究参照。

二、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

目前对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领域。这两个领域按照其研究范式对唐代金银器的年代和演进路线进行考证，对相关器物进行分型分式，并讨论中西文化的交流问题等。对唐代金银器较早的研究是卢兆荫1964年发表在《考古》上的文章《关于西安北郊所出唐代金花银盘》，该文对《文物》1963年第10期上发表的简讯《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提到的出土的银盘铭文中的“裴肃”的身份进行了考证，指出了简讯中的一些问题。随着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的面世，国内学者们开始多方面地对该领域进行研究。1980年段鹏琦在《考古》上发表专题论文《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该文在初步掌握唐代金银器纹饰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对何家村金银器的装饰花纹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排比，并将何家村金银器分为了四期。该文还根据相关文献对何家村金银器出土地点是否为邠王府进行讨论。其对何家村金银器的分期至今还有学者在引用。此外，韩伟在《考古与文物》（1980）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金银器》，陆九皋、刘建国的论文《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试析》（1982），卢兆荫的论文《从考古发现看唐代金银“进奉”之风》（1983）、《试论唐代的花金银盘》（1986），刘建国的《试论唐代南方的金银工艺》（1985），朱捷元的《唐代金银器、银铤与衡量制度的关系问题》（1986），王长启的《西安市出土的唐代金

银器及装饰艺术特点》(1992), 冉万里的《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发现与特征》(1994)、《试论唐代北方金银器的发现与特征》(1997), 朱天舒的《唐代金银器与大唐气象》(1996), 谭学前的《西安何家村窖藏金银器》(2008), 赵瑞廷的《唐代金银器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承接》(2006), 杨小林、范立夫的《金银器制作中的传统细金工艺》(2006), 齐东方的《汉唐金银器与社会生活》(2006)等, 使唐代金银器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这些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唐代金银器的历史作用、功能等进行了研究, 不断地扩展研究视野。申秦雁、冉万里、谭前学、齐东方等学者在该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使得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日渐丰富和完善。

在唐代金银器研究的专著方面, 目前的成果尚不多, 但 1999 年出版的齐东方的著作《唐代金银器研究》可以说是此领域中的领跑者。该书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考古学的分期、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和兴盛原因、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其讨论以考古学为基础, 运用各方面资料(例如壁画、铜器、陶瓷器等)纠正了以往对某些器物断代的错误, 兼以大量文献资料佐证, 把金银器分期与唐代历史紧密联系起来, 将唐代金银器发展分为“飞速发展期”“成熟期”“普及和多样化期”三个时期, 使唐代金银器的整体历史面貌得以更加清晰地显现。全书共分三编, 第一编从考古学角度对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做了科学的分期, 并对不同时期金银器的造型、纹样、特征加以阐述; 第二编是对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和兴盛原因的研究, 并对唐代以前的金银器做了全面论证; 第三编着重对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的研究, 列举外来文化对唐代金银器发展的影响。该书意在通过对唐代金银器本身的研究, 展示更广阔、更深刻、更有趣的社会历史问题。另外, 齐先生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涉猎颇多, 从而在文化方面提出了对唐代金银器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系统——萨珊、粟特、罗马—拜占庭, 对其作用的阐释也非截然分开, 是在多种文化融合中寻求三者最基本的特点及对唐文化最直接的影响。该书在唐代金银器分期以及吸收接纳外来文化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

三、装饰艺术的研究

唐代金银器的造型、纹饰、装饰形式等与同期的其他工艺门类保持着同步发展。对唐代金银器的纹样等图像的研究从很早以前就有了, 只是当时尚处于分类及对金银器分期起辅助作用的阶段。国外研究唯英国学者罗森的《中国唐朝银器装饰》把装饰研究提到了重要地位, 但只限于对纹样渊源的讨论。进入 21 世纪后, 对唐代金银器的研究在纹饰方面更多一些, 且逐渐成为研究重点。

上文提到的段鹏琦的论文《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即是在掌握了时代装饰特点的基础上得以推进的。庞永红的《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论析》(1992), 张广立等

人的《唐代金银器纹饰内涵与分期》(2005),刘妹的《唐代金银器的图案装饰》(2006),卢新燕的《唐代金银器的造型艺术》(2007),赵琳的《唐代金银器造型与装饰的外来影响及本土化》(2008),杨琳的《唐代纹饰中的鸳鸯形象初探》(2014),王欣亚、王妮的《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文化——以摩羯纹装饰为例》(2015)等,对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装饰纹样、装饰特点、造型等某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尽管相对比较零散,但亦对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研究有所推进。

研究装饰艺术的比较成体系的论著是硕士论文,而且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较多,如陈研言的《唐代金银器角隅纹样研究》(2007)、段丙文的《论唐代金银器中的篆刻与捶揲工艺》(2007)、王丽的《唐代狩猎图案及狩猎俑的初步研究》(2012)、王雪的《唐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2015)、刘旭影的《唐宋时期宝相花纹样的比较研究》(2016)、刘筠臻的《匠心独出——唐代金银香毬设计研究》(2016)、卢孟迪的《唐代仿生茶具造型设计研究》(2016)、彭紫君的《西安南郊何家村金银器纹饰考》(2017)等。这些论文运用了考古学、图像学等不同的方法对唐代金银器的某一个具体纹样、器型的设计、工艺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虽然在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深度上还有发展的空间,但亦给本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参照。

著作方面,韩伟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虽然是一本图录,但其“简论”部分共三万余字,涉及“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的题材”“金银器的装饰构图”“金银器装饰图案的特点”“唐代金银器的装饰图案的演变”等内容,是当时在金银器装饰艺术方面比较全面的研究。由于侧重点不同,该书仅对装饰艺术中的纹样作了简单的陈述,缺乏深层次的分析。但该书给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图形资料,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本书的研究思路。齐东方的《唐代金银器研究》也非常重视对金银器装饰纹样的研究。他对很多金银器的分期断代的依据就是装饰纹样的风格、特点。在该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对器物的纹样进行了分析。根据装饰纹样在器物上出现的位置,他将纹样分成了两大类——主题纹样和附属纹样,并对主要的植物纹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该书对纹样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植物纹,提到了人物纹,其中没有涉及动物纹。限于研究角度,该书对金银器装饰艺术未展开研究,也没有指出金银器的装饰艺术在艺术史中的地位及其蕴含的美学思想。不过,这并不影响该书成为本书研究的一个基石,它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精准而广泛的出土文物和图形资料。另外,尚刚的《唐代工艺美术史》(1998)和田自秉、吴淑生、田青合著的《中国纹样史》(2003)两本书中亦有对唐代金银器装饰图形的部分介绍,有对纹样的演变及风格的较深入的描写。这些著作作为本书研究的体系架构提供了充实的内容和线索。

第三节 研究方法

在研究装饰艺术的思路和方法论方面,19世纪晚期以来,国外学界先贤已做出了许多科学性、系统性的探索和创造性的贡献。如瑞士著名美术史学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ifflin)在《文艺复兴与巴洛克》中,以图像风格学及移情论的方式,对建筑样式及装饰图形的历时性的演变现象和共时性的整体关系做了深入的阐释。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主要代表阿洛瓦·李格尔在其重要著作《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中,以纹饰的造型元素和组织样式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内的历时延续的关系为对象,作了图像风格学的研究。美国著名的符号主义美学家、现代艺术理论家及批评家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在《情感与形式》等著作中,从符号学研究方法入手,对包括纹饰(图形)装饰在内的艺术类型作了形式的(空间、时序及其他表现手法的)构造和形式的寓意及情感意味研究。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E. 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在其《视觉艺术的含义》中对肖像学和图像学原则做了阐释和运用,加强了美术史中图像(形)的类型化研究方法。英国当代艺术史学和艺术心理学家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在其《秩序感》中,以视觉心理学、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装饰图形的类型与功能、视知觉原理以及潜在的文化、道德寓意作了多层面的综合性探究。^①

鉴于这个题目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本书使用的方法是将传统美术史的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艺术风格分析法,考古中的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等综合运用,尝试从尽可能丰富的视角讨论问题。

一、图像学(Iconology)的研究方法

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是对美术内容的历史探究。它的目的是发现和解释艺术图像的象征意义,揭示图像在各个文化体系和各个文明中的形成、变化及其所表现或暗示的思想观念,以图像的构图及风格的类型特点为依据,去发现和阐释图形作品中潜在的象征性内涵及某些“征兆性”的价值寓意,包括其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以及艺术家创作的心理特性。

^① 翁剑青. 形式与意蕴: 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八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

二、艺术风格分析法

所谓风格是指艺术家、作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艺术风格作为一种表现形态，有如人的风度一样，它是从艺术作品的整体上所呈现出来的代表性特点，是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艺术家创作方面的特点和题材的客观特征相统一，所造成的一种难于说明却不难感觉的独特面貌。”风格主要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通过对形式的研究来把握风格的特征是艺术史学者所采取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由于受到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变化的影响，其艺术总体上会呈现出一种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艺术风格分析法，就是通过对艺术品的形式特征进行分析，归纳出其代表性的时代特征，而这种特征指示着这个时代的艺术风貌。此种方法以往多为美术史学者所运用，近年也逐渐得到考古学者的重视。

三、类型学

类型学就是通过对所研究对象的大量形态进行分期、分类型的排列对比，找出其形态变化的逻辑过程，并由此进一步探讨决定这些变化的人文因素。类型学也称为标型学、器物形态学，它是通过对考古遗存的形态排比，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以往考古学者多用其对器物做出排比分析，把握器物的发展演变规律，为考古学文化分期服务。但实践证明，类型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现代学者也将其运用到其他研究中，“对某一种典型器物或花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类型学研究，不仅能够理清楚一种器物或花纹的谱系，而且对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发展变化轨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等，均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四、文化因素分析法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指对考古学文化的诸多构成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在同周围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错综复杂的交往中实现的。”^①考古学中常用其揭示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文化源流、发展谱系和文化性质等问题。^②文化因素的内涵几乎可以包括所有

① 李伯谦. 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N]. 中国文物报, 1988-11-04.

② 詹开逊. 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装饰纹样初探 // [C] 新干商代大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324.

的考古遗存及其特征，它既可以是一些具体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建造这些遗迹和制作这些遗物的技术。同时也涉及一些精神文化领域的内容，如文化习俗等。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先行说明：

(1) 唐朝的统治时间为公元 618—907 年，但由于金银器制作历史发展脉络不限于此，所以在具体研究中，时间上会有所出入。

(2) 金银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银器泛指用金银制成的一切物品，狭义的金银器是指用金银制作的器皿和饰物。人们通常所说的金银器，多是狭义的金银器。因笔者才疏学浅，为避免挂一漏万，研究范围仅为金银器皿。

第二章 唐代金银器概况

第一节 唐代金银器兴盛缘由

鲁迅在《坟·看镜有感》中说：“遥想汉人多少因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唐朝统一全国后，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许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为保证税收，恢复社会生产，改良了隋朝的制度。土地政策上实行了均田制，税收上实施租庸调法，并扩大了隋朝的以庸代役法，规定了服劳役的最高期限。这些政策在客观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贞观政要》记：“囿囿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到唐玄宗时，唐朝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诗圣杜甫的一首《忆昔》形象地记录了唐玄宗开元年间的社会经济状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食。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毕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史载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政府粮仓积有粮食9600万石，人口也有很大增加。

在农业繁荣的同时，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并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唐朝商业城市不少，如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全国和世界性商业大都市。长安城市占地80多平方公里，人口百万以上。市内街道纵横交错，有专门的商业区，即东市和西市。市里有售货的店铺，称为肆；同行的肆聚集在一起，叫作行；在市的周邻地区，还有专门替外地商人存货出售的地方，叫作邸店。东市有几千个肆，200多个行；西市更为繁华，有许多外国人在此经商。洛阳也很繁荣，有南、西、北3个市，仅南市就有120行，3000多个肆，还有邸店400多个。另外，州县地方及乡村也有市在进行商业活动。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广州等地经水路，长安